

行为世范

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Model of Morality:
the Filial Sons Pictur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艺术史丛书 |

邹清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邹清泉 著

行为世范

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Model of Morality:
the Filial Sons Pictur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 艺术史丛书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为世范：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 邹清泉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艺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26000-5

I. ①行… II. ①邹… III. ①画像石—研究—中国—北魏
IV. ①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3195号

- | | |
|-------|---|
| 书 名 | 行为世范：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
| 著作责任者 | 邹清泉 著 |
| 责任编辑 | 任 慧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000-5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45307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7.75印张 247千字 |
|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9.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 录



序 言 / 001

引 论 / 004

上 篇 北魏孝子画像的历史遗存 / 015

第一章 北魏孝子画像的发现与研究 / 017

第一节 文献中的北魏孝子与孝子画像 / 018

第二节 北魏孝子画像的发现与研究 / 022

第二章 北魏墓室所见孝子画像与“东园”探考 / 037

第一节 关于“东园” / 038

第二节 北魏诏赐“东园秘器”历史情况 / 039

第三节 洛地北魏画像石葬具上的孝子画像与“东园秘器”
——从元谧石棺谈起 / 043

第四节 其他地区出土孝子画像与“东园”之关系 / 052

第三章 图像重组与主题再造——“宁懋”石室再研究 / 057

第一节 主属：“宁懋”石室质疑 / 059

第二节 “宁懋”石室画像的题材与程序 / 064

第三节 图像重组与主题再造——“宁懋”石室的再利用 / 074

第四章 北魏孝子画像石榻考辨 / 079

第一节 石榻形制 / 081

第二节 石榻围屏上的孝子画像 / 083

第三节 石榻画像的“图像程序” / 089

第四节 石榻时代与主属 / 092

下 篇 《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身份的转换 / 097

第五章 先秦汉魏时期的孝道思想与孝子画像 / 099

第一节 先秦汉魏时期的孝道思想 / 100

第二节 汉魏孝子画像的发现与研究 / 104

第六章 “子贵母死”与北魏中晚期孝风骤盛及《孝子图》的刻画 / 115

第一节 “子贵母死”之制的设立 / 116

第二节 文明太后擅权与“子贵母死”的历史转向 / 118

第三节 北魏中晚期《孝子图》的刻画与后宫对权力的把持 / 122

第七章 《孝经》与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的嬗变 / 135

第一节 关于《孝经》 / 136

第二节 讖纬与《孝经》神秘性的形成 / 137

第三节 《孝经》在北魏社会的播传与影响 / 141

第四节 《孝经》与六朝《孝子传》的成本：以蔡顺为例 / 154

第八章 北魏孝子画像的“叙事性”与“相关性” / 161

第一节 北魏孝子画像“叙事性”的消解 / 162

第二节 大孝题材的选择与刻画位置的转变 / 194

第三节 作为“相关性绘画”的北魏孝子画像与《孝经》之诱导 / 198

第四节 北魏墓室画像装饰中的升仙因素 / 200

第九章 从祠堂到墓室——北魏孝子画像图像身份的转换 / 205

第一节 “神灵归趣”之地——北魏墓室的象征性 / 206

第二节 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北魏孝子画像的图像身份 / 208

附 录 / 213

参考文献 / 247

图版索引 / 267

后 记 / 275

后记二 / 277

序言

20 世纪以来，山西、宁夏、河南等地出土大量北魏画像葬具，包括彩绘漆木和画像石刻棺槨和棺床。其中彩绘漆木葬具数量不多，山西大同和宁夏固原皆有出土，均为北魏早期遗物，如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棺床漆围屏、固原雷祖庙出土的漆棺。北魏画像石刻葬具数量巨大，且绝大部分出自河南洛阳，基本为北魏中晚期遗物，如出土于洛阳，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宁懋石室、纳尔逊美术馆的孝子棺和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的元谧石棺等。这些画像葬具不仅展现了北朝绘画和雕刻的面貌和成就，而且传达出当时知识、思想和信仰等方面的诸多信息，对于中国中古美术史、思想史以及南北美术互动、中外美术交流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目前出土的北魏画像葬具看，其图像基本围绕两大主题展开，即反映神仙道教信仰的升仙主题和体现儒家思想的孝子主题，其中孝子主题占有绝对主导地位。此外，部分葬具也融入了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图像与观念。在迄今所见北魏画像葬具中，孝子图画像葬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时代特色极为鲜明。20 世纪初洛阳孝子棺、元谧石棺和宁懋石室流失海外，很快就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兴趣，日本学者奥村伊九良、富田幸次郎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就对此有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北魏画像葬具的价值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孙机、黄明兰、郭建邦、罗丰、赵超、郑岩、林圣智、巫鸿、汪悦进、长广敏雄、加藤直子、黑田彰等国内外学者从图像内涵、形式风格、功能与思想性、文化互动与交融

等方面就历年出土的北魏孝子图画像葬具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近百年来关于北魏画像葬具研究的成果虽然丰硕，但并非完满，仍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孝子图像为何在北魏大盛？孝子图为什么大量出现在葬具上？孝子为什么大都出现在山林中？体现儒家思想的孝子图像与佛教等外来宗教图像之间的关系如何？5—6世纪中国绘画和雕刻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促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再思、再探。

基于“孝”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永恒价值，南北朝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转型地位以及北朝考古材料和文献史料相对丰富这一条件和该领域研究之现状与存在之问题这一事实等方面综合考量，邹清泉博士选择了“北魏孝子画像研究”这一课题，希望在系统梳理现有考古材料、挖掘已有文献史料，并立足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北魏孝子画像及其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和认真检讨，从而达到拓展和深化这一研究课题的目的，其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全书系统检视了该课题的学术史和现有考古材料，并在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北魏墓葬中的孝子画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着重分析了北魏墓葬中孝子画像与“东园”的关系，追溯了古代孝道思想与孝子画像的承传与变迁，揭示了北魏孝风大盛和孝子图流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透析了《孝经》的文化内涵及其与北魏孝子图的关系，阐释了北魏墓葬中孝子图大孝题材的选择、刻画空间的变化、表现形式的创新及其所具有的功能和象征意义。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书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在于作者较为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其一，“东园”在北魏孝子画像葬具的制作和孝子图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二，文明太后擅权后，“子贵母死”之制的历史转向是导致北魏中后期孝风骤盛和孝子图大行的一个重要历史隐因；其三，《孝经》与谶纬神

学的结合使北魏孝子图染上了浓重的天人感应思想和神秘主义色彩。把这种图像刻画在棺槨葬具上，其目的在于实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的丧葬功能，进而达到“妥死者之魂，慰生者之望”的美好祈愿。

总之，本书是近年来北朝美术史研究中较有深度的一本学术专著，书中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倾向，而且体现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看到邹清泉博士所取得的成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由衷欣慰。故书此短文，对该研究课题略作回顾与点评，以为序。

贺西林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07年3月20日

引 论

· 004 ·

行为世范——北魏孝子画像研究

成形于西周早期的孝行思想绵延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孝”的观念一经产生，即备受关注，并与国家政治产生密切联系。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孝”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礼遇，在迄今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思想信仰、文化艺术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 世纪以来，由于先后受到“五四”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影响（我国 20 世纪曾发生过两次贬抑孔子思想的运动，其一为“五四”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其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虽然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一定促进作用，却由于过分极端地否定儒家思想，从而影响了孝行思想在当时的传承及发展。“批林批孔”虽然是政治上的斗争，其目的也并非打倒孔子，却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及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孝”的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陷入沉寂的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研究乏善可陈，其后，伴随着北朝孝子画像石葬具的陆续发现与出土，孝子画像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年来，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孝子画像的图像内涵和墓葬功能上。

孙机在对固原彩绘漆棺的研究中，就漆棺所绘孝子像与墓主信仰作了探讨：

漆棺上既画孝子像，又画道教的东王父、西王母像及佛教的菩萨像，其中也应包含祈求冥福的用意。从这个角度

考察，则孝子像只不过是迎合时尚的装点殡葬之物而已。^[1]

日本学者加藤直子在为吉村怜古稀纪念所撰写的论文中，对北朝墓中的《孝子图》、随葬《孝经》的情况、北朝士大夫中孝的流行状况以及墓葬装饰的社会意义作了讨论，认为：

魏晋南北朝墓中产生两种“孝”的表征，即象征着孝的典籍——《孝经》以及《孝子传》的图像。士人们在遗言、丧葬礼仪中使用这些物象来显示孝德，并期待其能够在士大夫中得到积极评价并广为传扬。……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显示出为了后代而以宗族为单位来追求美名的态度。

将《孝经》纳入棺柩之中的行为，就是为了向他人显示自己拥有“孝”这种道德。在士大夫社会中，依照遗言及其指示所营造的墓，被认为是将自己以至宗族的道德昭示于世的一种手段。与象征着“孝”的《孝经》相同，刻画在石棺等葬具上的《孝子图》，也同属这种功能。……士大夫的这种丧葬礼俗，无非是向他人展示自己所具备的孝德。^[2]

在《北朝葬具的图像与功能》一文中，林圣智以对1983年河南沁阳出土石围屏的考察为起点，通过对藏于日本天理参考馆和美国旧金山美术馆、中国洛阳古代艺术馆、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肯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以及卢芹斋（C. T. Loo）旧藏四组石围屏的复原，探讨了石榻围屏墓主肖像与孝子画像的关系以及石棺的图像构成和象征性，指出：

面向墓主合拢的《孝子图》的构成，既表现出子孙对故

[1] 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第38—44/12页。

[2] [日] 加藤直子：《魏晋南北朝墓における孝子伝图について》，载吉村怜博士古稀纪念会：《东洋美术史论丛》，东京：雄山阁，2000年，第113—133页。

世父母的尽心孝养，也表现出不愿离开父母的哀伤之情。石棺床围屏上的《孝子图》，既是死者家属所应效法的典范，也是将葬礼中丧家的孝行看作是《孝子图》的现世的体现。丧家通过《孝子图》，表明自己对于死者不忘孝道，另外，人们也可以看到，被称作孝子的丧家正在扮演着《孝子传》中的角色。……就其本质而言，石棺床的图像特征就是生者与死者的接点。子孙们正是通过石棺床围屏上的《孝子图》，展现着被理想化了的生者与死者的关系以及生者对于死者永远的孝心。^[3]

贺西林在对北朝画像石葬具所作综合研究中，以元谧石棺为例对北朝画像石葬具孝子画像作了探讨，提出：

元谧石棺上的孝子故事图像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彰显生人之孝行和颂扬死者之品德，而是与道教、佛教以至祆教的图像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是一种事关墓主命运和归宿的象征性图像。表明墓主人只有崇尚孝行，并具备了“孝”的品德，最终才能进入仙界、天堂，从而达到幸福的永生和不朽的快乐。^[4]

郑岩也就北朝孝子画像的图像功能提出个人见解，即：

中原的孝子画像还可能受到高士题材的影响，兼有升仙的色彩。^[5]

[3] 林圣智：《北朝时代における葬具の图像と机能——石棺床围屏の墓主肖像と孝子伝图为例として》，《美术史》2003年第154卷第2期，第207—226页。

[4] 贺西林：《北朝画像石葬具的发现与研究》，载〔美〕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41—373页。

[5] 郑岩：《南昌东晋漆盘的启示——论南北朝墓葬艺术中高士图像的含义》，《考古》2002年第2期，第84页。

除加藤直子与林圣智外，其余几种观点均将孝子画像与墓主“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但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原本作为导人向善的《孝子图》因何进入墓葬空间并实现功能转变，从而扮演起另一种角色，尤其引人深思。其中，受谶纬影响的《孝经》在北魏孝子画像图像内涵与时代功能的嬗变中，发生关键性影响，这一论点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文献依据：

其一，《孝经》及其宣扬的孝道观念在北魏社会的广泛流行。

一般认为，北魏时期的孝行思想与观念是在文明太后秉政或孝文帝迁洛以后才得以发展起来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献表明，至迟在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元年（409）之前，孝的思想与观念就已经影响到拓跋部族的社会生活，并成为时人道德评判之重要标准。《魏书·太宗纪第三》：

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止，日夜号泣。太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6]

文献所记为拓跋嗣立为太子时，其母刘贵人被赐死的史实，拓跋嗣登基在永兴元年（409），所以，此事应发生在永兴元年（409）之前，从“帝素纯孝”及左右侍从“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的言论来看，孝的思想及观念在代北已有流传和影响。在北魏迁洛以前，朝廷还曾多次颁诏奖惩孝子和忤逆之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分别颁布于神麤三年（430）五月和太安元年（455）六月的两个诏令：

（神麤三年）五月戊戌，诏曰：“夫士之为行，在家必孝，

[6] 魏收：《魏书》，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页。

处朝必忠，然后身荣于时，名扬后世矣。”^[7]

（太安元年）六月癸酉，诏曰：“其不孝父母，不顺尊长，为吏奸暴，及为盗贼，各具以名上。其容隐者，以所匿之罪罪之。”^[8]

此外，皇帝、太子、大臣等还曾宣讲《孝经》。孝文帝迁洛之前，孝的思想与观念在代北已有一定影响，并在迁洛之后有进一步发展。

其二，《孝经》中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北魏孝行信仰产生影响并使之发生了变化。

《孝经·感应章》：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9]

早在明元帝泰常四年（419）八月，太庙博士许钟进言时已提及上述内容，言曰：

臣闻圣人能飨帝，孝子能飨亲。伏惟陛下孝诚之至，通于神明。^[10]

亦见于太和十四年（490）诏令：

[7] 魏收：《魏书》，卷四，第76页。

[8] 同上书，卷五，第115页。

[9] 胡平生：《孝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49页。

[10] 魏收：《魏书》，卷一百八之一，第2737页。

诏曰：“苟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亢旱，时雨不降，实由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省启以增悲愧。”^[11]

《魏书》卷五十更有详载：

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则，人之所崇，莫重于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远趣，心耳所及，敢不竭诚。”高祖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于怀。”明根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如此则孝顺之道，无所不格。”^[12]

两则文献均为文明太后去世时孝文帝元宏和大臣的对话，表明《孝经》在平城时代上层社会已有广泛流传，迁洛之后更有深入影响，且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其三，“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的孝感故事诱导了北魏孝行信仰的异变。

《魏书·孝感》记载吴悉达和王崇两则至孝感天的孝行故事，此外，《北史·萧祗》：

子放，字希逸，随祗至邺。祗卒，放居丧以孝闻。所居庐室前，有二慈乌来集，各据一树为巢，自午以前，驯庭饮啄；午后更不下树。每临时舒翅悲鸣，全似哀泣。家人则之，未尝有阙。时以为至孝之感。^[13]

[11] 魏收：《魏书》，卷二十七，第669页。

[12] 同上书，卷五十，第1115页。

[13] 李延寿：《北史》，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9页。

《北史·陆通》：

父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后宅侧忽有泉出，而有鱼，遂得以供膳。时人以为孝感所致，因谓其泉为孝鱼泉。^[14]

《周书·宗懔》：

历临汝、建成、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呕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有群鸟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称之，以为孝感所致。^[15]

《周书·柳霞》：

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泝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愬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16]

南朝文献亦可见相关记载，《梁书·陆襄》：

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将八十，与萧琛、傅昭、陆杲每月常遣存问，加赐珍羞衣服。襄母尝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栗浆，是时冬月，日又逼暮，求索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

[14] 李延寿：《北史》，卷六十九，第2391页。

[15] 令狐德棻：《周书》，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60页。

[16] 同上书，第767页。李延寿：《北史》，卷七十，第2442页。

浆，量如方剂，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所致也。^[17]

《梁书·处士》：

（阮孝绪）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惊而返，邻里嗟异之。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钟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值，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后，至一所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时皆叹其孝感所致。^[18]

《陈书·徐陵》：

（徐）份性孝悌，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19]

《陈书·文学》：

（阮卓）性至孝，其父随岳阳王出镇江州，遇疾而卒，卓时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属侯景之乱，道路阻绝，卓冒履险艰，载丧柩还都。在路遇贼，卓形容毁瘁，号哭自陈，贼哀而不杀之，仍护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风，船几没者数四，卓仰天悲号，俄而风息，人皆以为孝感之至焉。^[20]

[17] 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09页。

[18] 同上书，卷五十一，第740页。

[19] 姚思廉：《陈书》，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36页。

[20] 同上书，卷三十四，第471页。